

编者按:2017年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立人之一李大钊就义90周年。几位专家学者建议,以唐山学院学报“李大钊与中共党史研究”栏目为平台举办一次全国的学术研讨会,这个倡议得到了社会各界一致的认可和支持。在几位专家的悉心指导下,确定了会议主题及征文提纲。之后,在《光明日报》等媒体刊登了征文启事及征文提纲,得到了党史学界的热列响应,收到了一大批稿件。经过专家评审,选出首批10篇稿件在本栏目刊出(以后将陆续刊出其他优秀稿件),以表达对先烈的无限崇敬与纪念。

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探索与思考

——以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为基点

梁 柱

(北京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摘要: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关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并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说明。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阐述,反映了他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新方向、新道路的探索与思考。他在比较中正确地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阐释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必然带有自己的特点。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坚定信念,有助于他正确解释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而对中国革命面临问题的正确回答,也是使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传播;社会主义观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7)02-0001-08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7.02.001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Li Dazhao's View of Socialism

LIANG Zhu

(Center for Theoretical Stud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When spreading Marxism, Li Dazhao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entatively explained them with Marxist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His comprehension and elaboration of socialism demonstrate his 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new orientation and the new road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作者简介:梁柱(1935—),男,福建福州人,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

tion. All things considered, he chose scientific socialism, explained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pointed out that socialism in China must hav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Li Dazhao's firm belief in the socialist goal helped him to explain the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orrect answers to them are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socialism.

Key Words: Li Dazhao;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socialist doctrine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者,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不仅比较全面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而且关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并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说明,深刻表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阐述,反映了他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新方向、新道路的探索与思考,这不但对于当时中国革命的新取向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而且其中的一些观点对今天仍然有启迪作用。这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

—

从 19 世纪末开始,在中国就零星有一些刊物、文章提到马克思和他的学说,也出现了诸如《共产党宣言》片段的翻译。应当肯定,这种情况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它已引起这个东方大国像梁启超、朱执信等思想家、民主革命家的关注。但这还只是作为一个学派提到,无意于扩大它的影响,有的还是用来附会自己的主义,用来证明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我们所说的十月革命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是达到了应有的广度,是比较全面地、持续不断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二是达到了应有的深度,它是作为科学的信仰加以传播,并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起点。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人,就表现了上述两方面的特点。所以,李大钊能够把社会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新取向,能够初步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探讨和思考,形成有实践意义的社会主义观,

就不是偶然的。具体地说,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基于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时代意义的正确判断。十月革命为中国人民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范本。正因为这样,如何认识和对十月革命,就成为检验是否真正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试金石。这是需要有理论勇气和历史眼光的。十月革命的消息虽然很快传入中国,但中国的一些报刊、文章也加入世界反动势力集中全力诬蔑和攻击俄国革命的大合唱,同样充满了“布尔什维克之阴谋”“过激派阴谋”“过激派侵入之危险”等耸人听闻的报道。李大钊则以敏锐的眼光,大无畏的精神,于 1918 年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等著名文章,集中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他明确判定处在不同历史时代的法俄革命的迥然不同的性质,正确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1]226}。认为正是这一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他预言:“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1]225}他强调对于这“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我们的态度“唯有翘首以迎”,“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1]228}。他还进一步对十月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作了较深入的分析,指明了它的指导思想、革命的目的和革命的依靠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俄国革命所蕴含的基本内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李大钊把十月革命比喻为“惊秋之桐叶”“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他并从这个新的革命时代中看到建造新的中国的一线曙光。

他说,十月革命对于中国,“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1]268}。在他以后的论述中,则更加明确地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2]67},即新的世界革命一部分。在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李大钊这时所追求的民主主义已不再是法国革命时代的旧民主主义,而是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相联系的新的民主主义。这种对于历史时代发展的正确说明,表明中国革命已有了新的取向,这是形成他的社会主义观的重要前提。

其二,基于对资本—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帝国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而只有科学揭示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和接受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民主革命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但在一个长时期内,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的阶段,在反帝斗争中或是采取单纯排外的错误做法,或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前者有义和团运动的悲剧;后者有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他一生“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3]。所以,近代中国革命惨痛的历史教训都同这个带根本性的缺陷相联系。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由感性进到理性的阶段,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们普遍迷惑于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庆祝英美等协约国胜利的时候,李大钊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揭露了这次大战的真正原因,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1]255},这就从经济的和阶级的根源上开始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明确的认识。1919年1月,他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第一次准确地表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指出日本军国主义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实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它是与民族

自决主义直接对立的。他明确提出了“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1]270}。即实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的斗争任务。他还深刻地指出当时外国驻华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1]341},形象地揭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军阀统治者之间的主子与奴才关系,引导人们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联结起来。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李大钊《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深入地总结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思想。这就是:一方面,要不畏惧帝国主义,不轻视“民众势力”。他说,“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像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阔,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权威,因而发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他搏战,信他必可摧拉”。另一方面,要认清帝国主义凶恶的面目,它们是“挟国际猜忌、利权竞争的私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论他是东方的、欧美的,绝讲不出公道话来”,对它不应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强调:“我们应该信赖民族自决的力量,去解决一切纠纷,不可再蹈从前‘以夷制夷’的覆辙。”^{[2]77-78}这里所揭示两个对待帝国主义的正确思想,是在透彻认识帝国主义本质的基础上提出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同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思想是相似相通的,这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在理性和策略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的形成,有决定性的意义。

其三,基于对中国革命新取向的探索。十月革命爆发时,中国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已在其6年前发生。虽然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巩固发展革命的成果,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国家的情况反而一天天坏下去。其间,发生了

袁世凯、张勋两次复辟帝制的反动逆流,而孙中山针对袁世凯专制主义的“二次革命”也以失败告终。这种情况,正如鲁迅后来所说的:“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4]这的确说出了当时一般先进分子的心态。这种情况,既反映了他们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场革命结局的完全失望,也表现了他们经过对民主和科学的呼唤之后仍然看不到前景的深刻反省。于是,开始了对中国革命发展新方向的探索。这时,各种新思想、新思潮像潮水般涌入中国。中国人民在比较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说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基本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中国社会指明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所以,选择社会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新取向,就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最后还要指出,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使他能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就重视运用这一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从而能初步指明符合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正确方向。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是中国革命发生历史性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但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国情的极大特殊性,就使得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必须加以正确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说,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是从书本出发照搬照抄,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两种对立的不同学风,这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前进还是后退的重大问题。而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期,李大钊就比较自觉地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应用于实际才能发生效用。1919年李大钊在同胡适的论战中,针对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谬说,指明“宣传理想的主义”和“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道理,并特别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

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2]3}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光辉思想。李大钊对包括他的社会主义观在内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都蕴含着这一正确的学风。

二

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业中,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中国革命的前途,他努力运用新的理论武器,探索和思考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由于他的早期思想就有活跃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所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能够从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的角度观察历史,敏锐地看到社会主义的兴起乃是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在这时提出的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对我们今天仍有启迪的意义。

首先,在比较中正确地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之时,各种名目的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等,都以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李大钊在阐述社会主义思想时,不但同基督教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费边社)、行会社会主义等思潮划清界限,而且比较准确地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圣西门、傅利叶和欧文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既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也指出了历史的局限性。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分两种,即空想的社会主义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彼之社会主义是属于空想者。但一般人均鄙弃空想社会主义,因为不能实行之故。至于科学社会主义可以实行,遂为人所重视。其实不能如是,因空想社会主义是母,科学社会主义是子,故其关系颇切。”^{[5]206}主张“取其精者,弃其糟糠可矣”^{[5]211}。在这里,“母”与“子”的比喻虽不很精当,但它所包含的继承性和超越性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

我们知道,当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之后,在大地升起文明曙光的同时,私有制的残酷性和不合理性也开始显现出来。世界上不同民族都有先进人物苦苦追求和探索更加美好而合理的社会理想,但限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个美好的愿望还只能寄托在诸如“桃花源”式的梦幻之中。以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为标志,开始了人类的先进分子对高于资本主义的美好社会理想即社会主义社会的思考和追求。这就是长达三百多年,到18世纪达到比较完备状态的空想社会主义。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同情劳动群众的贫穷和苦难,开始探究造成劳动者悲惨境况的社会原因,探索消除这种社会弊病的途径。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为启发工人觉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对未来的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和天才的预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但由于他们还没有能够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来揭示未来社会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追求也还停留在伦理道德的范围内,没有找到正确的实现途径,因而还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这就如李大钊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成为实际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仅以人的理性为根据,力量极为薄弱,如砂上建楼阁也”^{[5]207}。到了19世纪,在继承人类先进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又同当时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并以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指明了实现这一社会变革的途径、手段和社会力量,从而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传播,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次历史性飞跃,也使进步人类的理想和追求获得了科学的依据。

正是通过上述这样的比较,李大钊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实际运动,应该具备政治、法律、经济

三个方面的特征,他说:“照政治方面言,必须无产阶级专政,方合其目的。……照法律方面言,必须将旧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废止之,扫除之,如私有权及遗产制,另规定一种新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将资本财产法、私有者改为公有者之一制度。从经济方面言,必须使劳动的人,满足欲望,得全收利益。”^{[5]195}李大钊把这作为观察社会主义的依据,也作为分析和批驳各种不同的错误主张的依据。这里虽然个别的表述还不够准确,但就其本来意义说,他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制度上要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在分配上,劳动者要获得最大的利益。应当说,这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也是未来社会主义必须体现的基本特征。

其次,阐释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以极端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不但使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极大的怀疑,而且也有助于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李大钊曾从智、情、意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他说:“由智的方面观之,社会主义此为现在存在之资本制度之批评指南。由情的方面言之,则为以新的、好的秩序,代替旧的、坏的制度。由意的方面言之,则使人发生努力,以平静寻秩序,代替旧秩序。”^{[5]194}这就是他所说的,从精神方面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表现。

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初期,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产生种种误解和偏见,李大钊为此专门写了《社会主义释疑》一文,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也以专门一节回答“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他在释疑中阐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这主要有:(1)针对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会使人“穷苦”“不享福”的错误观点,李大钊指出,资本主义才是使大多数人穷苦,享福的只是少数人,社会主义正是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所以,“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整理生产,就是通过有计划的增殖,不断扩大社会生产力;通过合理的分配,彻底改变多数穷人

供奉少数富人的状况,“这样一来,就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2)针对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会“发生怠工”“决不发生竞争”的观点,李大钊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实行强迫工作,非常痛苦,同那牛马一样,得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免除工作的苦痛,发扬工作的喜悦,那里有像现在劳动的劳动者,有怠工的现象发生!”李大钊认为,社会由竞争而进步,社会主义社会有正当的竞争,它所反对的是那种“使人类入于悲惨之地”的资本主义的竞争;它所禁绝的,是那种“使人犯罪等”的不正当的竞争。(3)针对有人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是不自由”的观点,李大钊指出,“有了经济上的自由,才有真的自由”。“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那有劳动者的自由,只有少数的资本家的自由”。因为生产资料,包括高楼、大厦、汽车、马车等生活享受物都被他们占据,而劳动者劳苦终身还得不到温饱。“所以我们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5]354-456}。上述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李大钊已有很高的认识水平,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介绍唯物史观的工作,并努力运用这一新的历史观阐述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问题。他对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因而他在说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是充分重视公有制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未来社会主义实行国有经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他说,“一切生产事业都归国营,则小工厂都合并于大规模的工厂,俾收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因为,“从前私营的经济组织之下,有很多很重要的生产事业,或因利益不多,或因效果难期而置之不理者,今则国家都一律照办”。他认为,这样做,能够有效地、合理地利用和发挥各种资源的作用,他说:“依极经济的组织与方法,把资本、劳

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利用自然力开发富源,俾利国用。”他还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有了强大的国营经济,还可以同国际进行经济合作。他说:“有需国际的共营的事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间亦可共同举办,但此实有利无害,断非现在什么中、日合办,中、英合办的种种事业可比。”总之,在李大钊看来,未来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具有很大的好处,“在这种经济组织之下,无论工农生产事业均渐扩大,生产自然增加。此时最经济的运输法日渐扩张,既便于材料的供应,又便于成品的分配,于生产事业、分配事业均有利益”^{[5]136}。上述这些看法表现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深入的见解,精彩迭起,这对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是很有帮助的。

再次,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必然带有自己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不是千篇一律的、一成不变的。这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6]李大钊在论述社会主义时,同样指出不同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要把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既要遵循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要表现出自己的特点。他说,“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他特别对共性与特性的结合作了明确的说明:“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李大钊正是根据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原则,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5]197}。诚然,这时社会主义运动刚在中国兴起,还缺乏实践经验,李大钊不可能对这种中国特性作出具体的阐述,但他为此提出的一些思想仍是很有意义的。比如,中国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同本国

资产阶级应该有不同策略;又如,提出思考中国问题,不能离开中国的国情,包括“近今之国情”即现实的社会和“往昔之国情”即中国的历史;再如,提出要注意“施展我们的民族特性”“表扬显著我们的民族精神”,等等。这些思想,对我们探索自己的特性具有方向性的意义。

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往往把社会主义作为直接的目标提了出来。1921年1月,李大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一文中,就提出“现在的中国能否即可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他反驳了那种认为只有实业发展了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指出“在现存制度下不可能发展实业”,要“使人们了解发展社会主义实业的方法,就是说劳动者能为自身的利益而发展实业需要有一个过程,掌握这些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他明确表示:“我坚信,将来是必将要进入这一步的,这是最终而且必须达到的目的。”^{[2]255}同时他表示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这反映了李大钊具有的卓越看法,同时也表现了他探索的特点。应当肯定,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坚定信念,有助于他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而对中国革命面临问题的正确回答,也是使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重要条件。除了上述他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初步论述和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之外,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指明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新的领导力量。近代中国新旧革命转换的主要标志,就是领导权的变化。因此,对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仅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问题,也关系到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热情歌颂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中表现出来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认为这是不可抗拒的伟大的历史力量。他特别指明今后人类发展的前途必将是“劳工的世界”,并在1919年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

文章中就预测了中国工人运动必然会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身受的压迫是极为深重的,他们既受本国资本家又受外国资本家的压榨,“他们这种受他国资本家间接压迫的影响,比各国无产阶级者受他们资本家直接压迫的影响还要厉害”,因而有坚强的革命性。他批驳了那种认为“中国劳动者与社会无关”的错误论调,指出他们能够组织起来,同世界各国无产者联合,在本国社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党内有的人对于工人阶级的力量表示了悲观失望,对于工人运动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与此相反,李大钊却从二七罢工斗争中进一步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专门在广州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大会上发表演讲,热情地讴歌“为自由而战的劳动同志何等壮烈”。明确地强调:“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5]393-394}正是工人阶级的这种革命精神“引导吾人向前革命,以打倒军阀并国际帝国主义!”^{[5]394}充分肯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先锋作用。虽然当时全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还处在不完全自觉的状态,而李大钊在这里确是表现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对于中国革命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指明了农民群众是伟大的革命动力。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中国共产党只有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才能保证民主革命的胜利,也才有社会主义的前途。李大钊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极为重视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7]76}同那种所谓农民“保守”“散漫”“难以加入革命”的错误估计相反,他断定在农民群众中间蕴藏着大革命力量,他说:“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

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7]85} 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为了把农民群众广泛深入地发动起来,李大钊还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首先,要“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因为只有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他认为,“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这是在乡村中开展农民运动的“第一要紧的工作”^{[7]84}。其次,要注意武装农民。只有这样才能抵抗一切反动势力的压迫,他强调农民武装是农民自卫的性质,要严格防止被军阀、土豪、土匪利用。再次,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耕地农有”是广大贫农的急切要求,革命当局应该“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7]83}。他还号召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到农村去进行工作,进行农民运动,以便引导在水深火热的沟洫中倒卧着的广大农民“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7]133}。李大钊对农民的正确态度和正确策略,同毛泽东坚持的正确方向是一致的。

第三,指明了中国的问题要“根本解决”。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李大钊与胡适为代表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一场论争。这里涉及对中国社会改造是要根本解决,还是点滴改良?这也就是说,是通过渐进式的点滴改良,还是要进行革命变革的根本改造?针对胡适的改良主义的主张,李大钊认为,若在一个良好的社会里,一个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若像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它做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反复阐明了中国问题“根本解决”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他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

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为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这就正确地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针对胡适脱离当时的政治现实,反对根本解决,要求一点一滴地去解决从人力车夫生计到妇女解放等等问题,李大钊明确指出:“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2]6} 这就是说,只有进行经济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如若只进行点点滴滴、枝枝节节改良,不但在当时社会制度下无法实现,而且也永远不能为解决中国问题指明出路。李大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不仅为当时人们关注的社会改造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而且他明确把根本解决定位为改变旧的经济制度,从而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 [1]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4.
- [4] 鲁迅全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55.
- [5]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6] 列宁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275.
- [7]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夏玉玲)